

THE ORIGINAL DEFEAT

首败

甲午年的中日决战

师永刚 张凡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THE ORIGINAL DEFEAT

首败

甲午年的中日决战

师永刚 张凡 编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THE ORIGINAL DEFEAT 首败

| 目 录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	5
-----------------	---

第一卷 黄金时代：中兴的选择

甲 皇帝：一个与三个	15
乙 明治群英谱	22
丙 恭亲王与总理衙门	29
丁 曾国藩与士林之风	36
戊 女人当国	42
日本海战手绘图	63

第二卷 青铜时代：甲午之战

甲 上兵伐谋	83
--------------	----

乙	和尚的理想	96
丙	决战于黄海之上	117
丁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江湖	129

第三卷 白银时代：甲午后的中国

甲	师从日本	163
乙	紫禁之巅的耻辱	195
丙	甲午一代	199

跋：	少年中国说	211
----	-------------	-----

北洋海军舰艇史	217
---------------	-----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

甲午年，1894年。

写下这个坐标式的年代，可以顺着历史的灰烬找到那些消失的人和事。更多的人熟悉这个年份是因为一支庞大海军的覆灭。一支名义上称之为世界第七，或者世界第八——总之世界排名靠前的海军悲剧性地毁灭了。

闭上眼总能想象到那艘庞大豪华的泰坦尼克号，1894年的中国正如那艘出海的巨轮，刚刚醒来就迎面撞上了冰山。这是致命的一击，比1840年来自西方白人的枪炮声更为沉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接连不断的打击都像重重的敲门声，捶在帝国即将崩溃的门楣上。但最重的一击，来自东方。

“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一个相当委婉的说法，中国醒来了。事实上，一战而击碎的不仅是李鸿章无法修补的体制，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的人心。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在1840年即已流行一时，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这个变局是什么，那就是古老、僵化的帝国体系的结束，新的文明以极其野蛮的方式侵入。

没有什么比重读历史更让人感慨，大戏开场，后来者已经窥见结局，却偏要捏着汗，流着泪，看那些正在舞台中央的人与自己无法逆转的命运相抗争。在戏说历史的潮流中，我们试图重新回到甲午年的现场，在日本人的照片、西洋人的明信片、中国人的旧图册中梳理和打捞那些残存的证物，追求并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够立足的根本。

1891年，19岁的光绪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引起了域外观察者们的额外注意，没有人想到两年后的战争会摧毁一个帝国的根基。大清皇帝学习英语的新闻

成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切入口：“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让《纽约时报》作出如此判断的是光绪的一个行动：“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条花边新闻，但这已经足以让这份在美国逐渐产生影响力的报纸得出结论：“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倘若中国历史的前行按照上述逻辑推行，在1900年前后中国就应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了。《纽约时报》的推测看来绝非妄言，但显然光绪仅仅是玩票之举，如果把他看成一个热血青年，那么应当看到他当时所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传统古籍，新鲜的玩意当然会吸引他，如摄影、火车以及英语。但也仅此而已，倘若以为这位皇帝此时已经开始有变革之举，或者就此开始现代政治制度演练则纯属妄想。即使皇帝开始学习英语，即使帝国已经派了一百多名未来的精英前往西方学习，也未能改变急转直下的帝国命运。

人们总习惯于从历史的编排中找到节点。在光绪亲政前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与世界同步的上升之路，史称“同治中兴”。1868年可以看做是前甲午时代，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曾国藩带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重新使帝国的版图恢复统一；左宗棠出征新疆，使得中国的边疆免受分裂。中兴名臣们开始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方略大行其道，尽管1860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烧毁了，帝国的门开得更大了。但这不妨碍一个国家沿着惯性的轨道前行。此时，西方的洋枪、大炮、火轮船都已经开始为精明的军事家们所利用，李鸿章在其一手打造的淮军中更是大力普及西式武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政略看起来极为有效，西方对中国时有挑衅，但已经开始警惕一个强大帝国的复苏。

目睹历史是一回事，重读历史则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故事在此年上演。

1868年中国外交使团出访波士顿，美国文豪爱默生即席演讲，欢迎来自东方的古老王朝步入“民族之林”。宴会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现在不再对一个越出广州城墙的使节扔石头了。”不扔石头代表的是对强力的惧怕还是对国家新式交往的了解，他未给出答案。

这一年，第一批留美学童前往美国，其中十多人在二十多年后将直接参与甲午海战。在李鸿章主掌下的江南制造局建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排水量600吨。北洋水师从这里走出了第一步。

中国人开始学着与西方打交道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年一位急于升职的候补知府李光昭，谎称自己可以提供价值30万两银的木材供皇帝修复圆明园，此人想到的办法是“奉旨采办”，私刻衔章“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先后到四川、两湖等地招摇撞骗不成，便南走香港购买洋木，与法商议定木材价值为洋银54000余元，而在内务府报销时谎称值银30余万两，后来又拿不出银子支付法商，遂“与洋人结讼”。

事情闹大了，两头骗财的李光昭自然人头落地。但是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的计划也就此停滞，当时的舆论监督权在一群官员手中。但手握皇权的慈禧咽不下这口气，她与儿子同治合唱一曲双簧，将时任总理大臣恭亲王先免职后复用，酷似今日的官员问责。此事的后遗症一直要延续到1894年，当慈禧60大寿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敢再对重修颐和园说三道四。

根据1933年实施的废两改元令，7钱1分5=1元银币

当大清国的皇帝有被洋人起诉的危险来临之际，在海洋的对岸，一个岛国上一个新的政府刚刚成立。该年4月6日，睦仁天皇发表了《五条誓文》，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方向。同年9月8日，江户改名为东京，皇帝将其年号改为“明治”。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宣布了一场竞技赛的开始。但是一方极力要恢复传统，李鸿章自称补锅匠，要补救的是一口四处漏水，遍体裂痕的体制之锅。一方却要砸倒重来，全盘西化。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史上教父级的思想先驱，在其著名的《脱亚论》中说道：“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中、朝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中国、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中、朝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日本人作出了重要的选择“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后来者难免被这样的尖锐言论所刺痛，但正视现实的日本人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日本有人提出“兴亚论”（后来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有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胜海舟、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樽井藤吉等。但是“兴亚论”所倡导的日、中、朝三国联手唤醒亚洲，抵抗西洋的主张在论战中败北。

两个国家就此驶向了不同的方向。开始的方向固然相同，路径选择也相近，但最终相异的目的却导致了后来不同的结局。

在世界史上，这同样被视为黄金年代，一个帝国雄起的年代。1861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四年南北战争后，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强大国家逐渐成形。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在他的

领导下，德意志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统一的历程。1868年，在普法战争中，德军俘虏了10万法军，其中包括法皇拿破仑三世本人。随后，俾斯麦挥戈巴黎，并在拿破仑帝国倾覆后的废墟上，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在西方帝国成形的过程中，东方的帝国同样有着腾飞的机遇。

日本的前驱者带领日本开始了极度痛苦的现代化进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王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强国。

在清国中兴之路上，1868年任命的第一位外国官员赫德，显示了他对帝国的忠心。他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一份改革方案起名为《局外旁观论》呈给皇帝，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其中若干方案后来屡见于百日维新时的新政。当政者恭亲王亦认同这份方案“所陈内政外交各种利弊，无不谈言微中”。但他的作为仅限于将此方案传给各地方大员，谨慎研究。此后赫德屡次写就各种改革方案，均徒劳无功。1883年在自己的日记里他写道，“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烦恼了……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这条杀不死的巨龙会经受住一切的”。

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作为清国第二任驻外大使。在1886卸任回国时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将中国喻为“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称中国的富强运动意在自卫，一无军事扩张的企图，二无移民海外的必要，当务之急是“善处寄居海外之华民”、“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他试图向外国说明中国的方向，但是在帝国的政局中，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远非一个决策者。但“睡狮”之说就此风靡一时，影响无远弗届。

西方的观察者中，对东亚国家的变化，既有欣喜又有担忧。英国公使阿礼国在其写回的报告中称：“对于变革和引进全面大规模改革这一问题，西方列强既寄予希望又怀有恐惧。这个问题无疑也与（中华）帝国及其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命运相联系。现在必须作出决定，这个千疮百孔、老态龙钟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历一次复兴，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应该在一种解体的衰落的过程中逐渐地但彻底地毁灭，包括它在帝国内外的一切影响的清除。”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则对此不以为然，他尖锐地指出：“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报道称：把大清国说成是被抑制了气息的睡兽、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是多么的流行。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除了日本和俄国）阿谀奉承的态度又养成了这个国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觉，并一天天持续和发展下去。

在观察者中，还有一位后来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德国学者恩格斯。他在189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洞见了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但是，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无情排斥一切干扰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必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彻底结束。”

甲午一战，将整个帝国的虚弱暴露在世界面前，这些观察者窥破了帝国的软肋。更使得后来者对前30年的中兴之路大起怀疑。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责难是：

“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果无益于国人也！”

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

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这是后事之师。被我们“看到”的历史与被我们“读到”的历史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微观的、瞬间的，在现代人飞速地展开画卷时转瞬即逝，只有放在全部的画面中才能凸显巨大的悲剧意义。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灭亡，继而民国军阀混战。历史的推进迅速而急切，一代人刚刚开始崭露头角，即被风暴吹入无底深渊。甲午年的图像资料，足以使我们重回那个时代。那一年的战争影响所及，一代名臣黯然退场，新生代政治人物起而替之，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轮番登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对他们来说，那是绕不开的命运。

1894年，一座看得见的冰山迎面而来。所有后来者的命题，都在于将这艘即将沉入海底的巨轮重新扭转航向。过去100年来的历史进程，在学界被称为“中国问题”，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国本土的。这个问题渗透到所有的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和非政治经济议题中去。无可逆转的，不仅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当巨轮沉没，新的航向即将开始，历百年而寻找答案的人们都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命运。

回到甲午年，我们看到历史正在发生。

「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地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

——柏杨《中国人史纲》

「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18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在19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

——费正清《中国新话》

01

◎ 第一卷

黄金时代：中兴的选择

甲 皇帝：一个与三个

乙 明治群英谱

丙 恭亲王与总理衙门

丁 曾国藩与士林之风

戊 女人当国

变局。

在西方时代来临之际，有清一代的知识精英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变局”来形容他们面临的处境。台湾学者王尔敏考察了清末81位知识人的变局言论，有“古今之变局”、“天地一大变”、“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变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最夸张的甚至声称“不知几十万年未有之奇局”。

世变时异，一代精英们采取的姿态亦如李鸿章所言“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但曾游历英国的曾纪泽却称：“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舞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面临变局者，能否创万世之新局。自然令人关注，“同治中兴”就此被视为创局者之杰作而载入史册。但是令后人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兴更像是帝国的回光返照。由此，柏扬在《中国人史纲》中对创局者们深怀不满，他不无讽刺地称：“政治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无能，使新建立起来金碧辉煌的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

拳击手套，北洋舰队。在当代人看来，帝国的终结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有可能跃入现代化的跳跃中，邻近小国日本的变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完成了蜕变，后者用向西方学来的一切付诸一战，将清国最后一层遮羞布就此扯落。

变局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复杂化，一个进入深水区的国家从此无法回头。

甲 皇帝：一个与三个

睦仁，第122代日本天皇，号明治。他活了60岁，一生对位过三位中国皇帝。单纯地讲述一个人的丰功伟绩过于无聊，对照一位皇帝与三位皇帝的故事则相对有趣。

不同之“治”

同治皇帝长明治天皇4岁，6岁登基。但是这位长于深宫的青年18岁亲政后对执政一事兴趣不大，他在内监和宠臣引导下常常微服私行，常到北京崇文门外的



同治



明治天皇



光绪



宣统

溥仪开创了中国皇帝史上许多个第一。第一个剪辫子的清朝皇帝，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满清勋贵，第一个离婚的皇室成员。当然他最荒唐而又真实的举动是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三次登基，三次退位，再没有比这更令后人觉得离奇的遭遇了。

从登基、退位、出宫、复辟、傀儡、战犯到自觉忏悔成为公民，溥仪头上曾有许多帽子，载沣之子、宣统皇帝、逊帝、“满洲国执政”，“满洲帝国康德皇帝”、战犯和全国政协委员。但世人只记住了其中最响亮的一项——最后一位皇帝。

图为溥仪在伪满洲国时身着海军大礼服照片，又溥仪是满洲国海陆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配合礼仪需要，溥仪也可穿着海军礼服，袖章的标志是3宽道金线和3窄道金线。肩章的底板上是龙纹图案，表面安缀的标识包括满洲国的国徽图案以及用来区别衔高低的海军锚、梅花星图案。

美国《时代》周刊曾专访过此时的溥仪，称：“溥仪穿着一身卡其布的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亨利·溥仪忘记要他装作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好！’”

《时代》周刊最后为皇帝下的结束语是：“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